



復旦大學 | 一帶一路  
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系列研究報告

2018年第4期（总第11期）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的 文明对话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2018年10月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的文明对话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2018年10月



## 引言

2018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①</sup>。5年来，“一带一路”成果斐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正促进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和发展。2013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我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引发全球关注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思想。习近平同志在多个不同场合向世界传达了该理念与思想。201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习近平同志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题，系统阐释了该理念的涵义，并将该理念写入十九大报告。

“一带一路”倡议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其中明确写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该理念。这些理念与实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它们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然而，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满着危机和矛盾。我们必须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误解甚至敌视，必须应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制造的各种麻烦，必须设法避免国际上周期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而中东的战乱、极端主义盛行、难民危机、西方的极右翼势力抬头等问题也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带来极大的挑战，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中，中国的倡议和理念更显着弥足珍贵。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智慧和方案正不断地影响着世界、改变着世界，为全球治理体系进步和发展、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

<sup>①</sup> 《坚持对话协商共筑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人民日报》，2018年8月28日，第01版。

## 目 录

引言 .....	1
一、“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文明对话 .....	3
1. 文明发展的多元逻辑 .....	3
2. 文明对话的多维性 .....	4
二、“一带一路”视阈下文明对话的障碍与困境.....	6
1. 西方文明带来的悖论 .....	6
2. 国家利益冲突与互信缺失 .....	6
3. 文明对话机制的不完善 .....	7
4. 文明对话中的三种误区 .....	8
三、“一带一路”视阈下文明对话的未来之路 .....	9
1. “多元逻辑、多元共生、多元共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9
2. 防止“中国模式”陷阱，恪守“中国经验”尺度 .....	9
3. 通过文化交流促进文明对话 .....	11
4. 构建网络时代的新型文明对话 .....	12
5. 建立文明对话的机制、管道与形式 .....	12
结语 .....	14

## 一、“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文明对话

### 1. 文明发展的多元逻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涉及 60 多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响应这一倡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还在扩大，这涉及到了全世界大多数文明，文明交流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言道：“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多元化、网络化的洪流中更加紧密地接触着，在不断地碰撞和交流中，应对危机，共谋发展。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把 6000 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 21 个成熟的文明<sup>①</sup>，而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等学者根据地理空间和历史发展将二战后的人类文明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sup>②</sup>。这些文明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在历史长河中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世界文明在近现代历经劫难，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明之间意识到需要加强对话和交流，互相借鉴有益经验，共同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寻求快速发展与共同进步之路。

文艺批评家朱丽叶·克里斯托娃用“多元逻辑”来描述语言活动的主体在产生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他者的否定性割裂中，一元逻辑和异质逻辑的持续对话是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sup>③</sup>。文明的发展也处于类似的多元逻辑中，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从产生之初就维系其一元的独立性而发展到今天，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更是典型的例证。华夏几千年文明始于不同部落文明的冲突和融合，这也是炎黄子孙称谓的由来，封建帝国的统一与更迭伴随着与周边民族的战争和交流，丝绸之路也随之形成。中国本身的多民族融合与统一、少数民族夺取政权的历史也是不同文明碰撞与交流的历史。近代西方文明的强行侵入一方面给我们民族带来痛苦的回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明白，维持文明的一元逻辑是行不通的。中华文明被众多学者称为“儒家文明”，但今天我们的儒家文明与千年前的儒家文明已经大有不同，今天的儒家文明是中国多民族文明兼收并蓄、融合发展，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借鉴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结合体。在多元逻辑的对话中，旧的传统吸收了他者文明的成分形成新的传统，由而推动历史的进程。中华文明的快速重新崛起正是中华民族在文明的多元逻辑中适时地传承与否定、变革与发扬的结果。

---

<sup>①</sup>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下）》，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sup>②</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年。

<sup>③</sup> [日]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王青、陈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67 页。

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人们希望通过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学，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撒和平理念的种子……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sup>①</sup>，这代表了中国对文明交流的基本态度。对于文明交流的作用，习近平同志说，“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sup>②</sup>。

### 2. 文明对话的多维性

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斯1976年在《哈钦森世界历史》一书中将文明解释为“所收多于年耗，温饱之民喜有积余，于是谋生之外，复有创造。创造的方法各异，品用不同，各制其物，共尽其美，于是有多姿多用的文明”，中国学者许国璋译注并概述为“吃剩有余，始有文明”<sup>③</sup>。也就是说，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与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1877年在《古代社会》一书中的观点一致，后者讲述了文明前期的六个人类历史阶段，而文明是指文明前期的文化进入一定历史时期的呈现<sup>④</sup>。西方学者看来，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这与中国学者将文明分类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等是相通的。现代社会中，不同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的对话和交流都涉及到文明的对话，这使文明的对话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多元化。从对话的主体来看，文明的对话可以分为国家间、民族间、地区间等，或官方、非官方等；从对话的领域来看，可以分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科技领域、军事领域等；从对话的形式看，可以分为国际会议、学术论坛、参观访问、展览、演出、赛事等。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交流合作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基础，现代社会必须在文明的交流中才能获得进步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文明对话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1年创立的“博鳌亚洲论坛”逐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对话平台，主要聚焦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问题；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成为展示中国形象、扭转西方舆论对华认知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汇聚了全世界体育健儿和媒体目光的北京奥运会也成为世界各国文明交流的窗口。同年，由中国发起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是继博鳌亚洲论坛之后，参照达沃斯论坛的模式和经验创立的又一个重要国际对话平台，旨在推动中国文化发

---

<sup>①</sup>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03版。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许国璋：《文明和文化——西方文化史选读讲演之二》，《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6页。

<sup>④</sup> [美] 路易斯·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年，第3页。

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上海合作组织”虽然主要聚焦地区安全等问题，也成为相关国家对话的重要平台，随着 201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上合组织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组织，地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五分之三，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景下，中国近两年来的主场外交也举世瞩目，2017 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 2018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都成为各个国家平等交流、对话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促进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文明间的对话。文明的对话在多元主体、多元领域、多元形式中不断地面对挑战、迎接发展。



## 二、“一带一路”视阈下文明对话的障碍与困境

### 1. 西方文明带来的悖论

中国学者许国璋曾在西方文化史演讲中言道：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但是文明却有<sup>①</sup>。近现代的发展中国家遭遇了西方先进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教育、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入侵，不仅仅是中华文明，整个亚非拉文明都在与西方文明的遭遇中面临断裂并艰难重生。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论述道：现代性代表的是一种现代制度与传统社会的“断裂”，而现代性的最根本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化”<sup>②</sup>，从而，这种“断裂”被带到了全世界，不过，西方的“断裂”产生于内，而亚非拉文明的“断裂”源于其外，是一种被强迫的“断裂”。这使得亚非拉文明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对亚非拉文明而言，第一个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在继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实现现代化。

西方的入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参照和“他者”。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批判西方霸权、西方话语、西方建构的东方<sup>③</sup>，但冥冥之中将西方确立为一个如影随形的参照，而名义上的“东方”却并非一个整体，其内部各自为政，且都以西方为主要参照。完全拒绝西方文明已经无路可走，但西方文明似乎又无法解决亚洲自身的问题。吉登斯将西方的“现代性”比喻成“猛兽”，它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同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地区局势等各方面问题已经使之难以“驾驭”。这意味着亚非拉文明还面临着第二个艰巨的任务，即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现代性的后果。但事实上，亚非拉各国已经被这种后果所侵入，且短时间内难以脱身。即便是发达的日韩、崛起的中国也难以避免。亚非拉文明必须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但西方文明的参照只留下一个悖论：亚非拉文明摆脱落后的地位就必须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参照西方，而参照西方又必须面临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悖论表明，亚非拉文明的发展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必须以自身的能力和经验的基点去实现发展中国家全面的进步，这就要求亚非拉各国之间紧密联系，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 2. 国家利益冲突与互信缺失

美国彭博社 2016 年 8 月 8 日刊出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该文将“一带一路”与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相提并论，该观点迅速被世界各大媒体转

---

<sup>①</sup> 许国璋：《文明和文化——西方文化史选读讲演之二》，《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9 页。

<sup>②</sup>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4、152 页。

<sup>③</sup> [美]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

载，并用以质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动机。2017年5月5日《金融时报》刊出了题为《习近平的丝路面临单行道的威胁》的文章，戏称“一带一路”为“一带一坑”（One Belt and One trap）。2018年2月，澳洲媒体曝出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和日本正探讨建立联合区域基础建设计划，试图替代“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国家的做法以及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种现象也体现出了其他国家对于利益冲突的担心，也体现出了文明之间互信的缺失。

亚非拉国家或非西方文明疲于应对与西方的关系，同时也为各国之间的矛盾所累。中东、印巴、东海、南海、朝核，等等，可以说处处都有紧张的地区局势，每个大国都有不友好或敌视的邻国，历史遗留和眼前利益争端交织在一起，西方势力往往和历史遗留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利用各种借口不断介入，使得亚洲各处地区局势都显得错综复杂。

中国周边只有北邻稍显太平，东海、南海局势近年来愈发紧张，美国重返亚太步步紧逼，中国的国力和国际战略极力避免战争的爆发，不过，危机仍触手可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2年创立以来发展态势良好，但由于东盟个别国家寻衅、其内部矛盾难以化解、美日势力干涉等原因，东盟与中日韩的会议常常成为南海问题的扩音器。其他国家问题更加严重，如中东乱局愈演愈烈，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策略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是中东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派别相互争斗的结果。在这种紧张的地区局势中，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互信难以形成，经济利益的互惠往往成为短期的互利互通，而乱局又成为西方介入的有力借口。“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中面临现实环境的考验。尽管米歇尔·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战争和斗争具有永恒性<sup>①</sup>，但历史的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虽基本远离了战争的威胁，但却饱受恐怖主义威胁，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或如中东战火纷飞，或如印巴和朝韩偶有擦枪走火，或如东海南海剑拔弩张，或如大国间为各自利益而互相倾轧。地区局势的动荡带来的互不信任给文明的对话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不断加深文明的隔阂和裂痕，而文明对话在形式上的不足以及在观念和思想上的不够深入也进一步助长了利益的冲突和互信的缺失。

### 3. 文明对话机制的不完善

尽管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已经有了多种形式的沟通和对话活动，但相对于各种文明在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对话机制尚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在文明的对话中，经济、政治、军事对话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沟通和交流最常见的形式，这些对话往往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现实利益的诉求，政府间的对话也主要涉及这三个方面。而更深入的交流需要站在人类整个文明的高度，去思考有关文化价值理念、人

---

<sup>①</sup>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文历史、文明进步、人类生存等更加深刻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认知与共识，以求未来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在这种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显得非常重要。

近年来，中国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些活动的不足也十分明显。比如，“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在文化的交流、合作、对话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首届年会就以“加强文明对话与合作，促进世界和谐与发展”为主题，历经三届已初具国际影响力。但是，其着眼全世界，范围和领域太广，论题很难避免与其他领域的重叠，而且其过于重视中国主导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官方色彩也过于浓厚，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获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也已在孔子诞生地举办三届，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但是，其过于突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虽以“文明”命名，但却忽视了现代文明及其他文明的维度，很容易成为儒家文化的寻根和中国传统的独角戏，这使其很难真正成为不同文明和文化对话的平台。因此，在亚洲文明对话的机制和形式上，中国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尝试。

#### 4. 文明对话中的三种误区

虽然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各个领域的沟通、对话和交流已经成为常态，但是，某些固有成见和思维仍然在影响或阻碍着文明交流的有效展开。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些固有成见和思维依然起作用。首先，“中国中心主义”的传播理念依然存在。我们一直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和预设，但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又很容易落入“中国中心主义”的陷阱。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中，单向强调“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话语权、文化领导权的论调随处可见。这一方面违背了“一带一路”的初衷，也背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且还会成为西方攻击我们的借口。其次，“灌输性”的传播方法和手段依然严重。我们的某些部门和某些人缺乏现代传播的专业精神和技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片面、教条的问题，单向传播的范式根深蒂固，“中心—边缘”式、“炫耀—救赎”式的传播心态也很常见。再次，“自我化”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依然盛行，这和上述两点紧密相关。自说自话、自言自语、自我陶醉的封闭式自我论述还很常见。

### 三、“一带一路”视阈下文明对话的未来之路

#### 1. “多元逻辑、多元共生、多元共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明对话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文明如何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向历经磨难的各民族展示了一条文明发展的基本定律：文明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在此基础上借鉴他者。文明的发展需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合作交流、共同发展。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sup>①</sup>，之后，习近平同志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多元化、全球化的整个世界而言，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想，它可能面临着“逆多元化”和“逆全球化”的冲击，但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文明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2018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sup>②</sup>。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建立在“多元共识”的基础上，文明的发展处于“多元逻辑”中，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从产生之初就维系其一元的独立性而发展到今天。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sup>③</sup>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文明对话要建立在“多元逻辑、多元共生、多元共识”的基础上，即“承认多元、尊重多元、理解多元”。文明虽然并未形成一个统一体，但其发展的历程已经说明文明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规律和逻辑，各国、各民族只有在文明的对话中正确认识并接受文明间的冲突和融合，才能推进各自文明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

#### 2. 防止“中国模式”陷阱，恪守“中国经验”尺度

中国的崛起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而且强大的中国并非如西方那样强制推行价值理念和政治体制，中国展示的，不是控制与霸权，而是有益于世界各国发展与繁荣的“中国经验”；中国提供的不是一种绝对的“标尺”，而是一种有益

<sup>①</sup>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文)，新华网，2011年9月6日。

<sup>②</sup>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人民日报》，2018年8月28日，第01版。

<sup>③</sup> 《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02版。

的“借鉴”；中国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是基于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契合”，而非强行推广或植入。正是基于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才能够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关于这一问题，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曾经有过相当深刻的思考。当国际间一度提出“华盛顿共识”和“中国共识”时，国内就有一些人士就认为这是中国地位在国际间的“飙升”，表示要迅速接受并大力宣传。但是赵启正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他认为，中国与许多国家，特别是与亚非拉的许多国家，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多种差异，不可能达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共识。接受这样的提法，无疑会带来麻烦。他提出，提“中国模式”虽然更合理些，但是“中国模式”任然有让它国效仿的不利因素。于是，赵启正先生提出用“中国经验”较为妥当。

日本是亚洲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它在古代时期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文明，在近代又全面西方化，它的成功也是文明融合的典型案列，但是，日本无法给亚非拉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有益的道路。正如英国学者赫伯特·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评价，日本“与世隔绝的文明对于人类命运总的形成没有很大贡献，它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sup>①</sup>。威尔斯的评价出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今天看来可能过于苛刻，因为日本近 30 年来大量资助了其他国家的发展，并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很难期望日本对整个亚洲未来的发展有太大贡献。首先，由于地理、地缘的局限，日本无法直接带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其次，由于侵略的历史及其态度，日本无法得到他国的充分信任；再次，由于其成功主要基于近代的全面西方化和二战后的美国支持，这两种方式无法让亚非拉多数国家接受或获得，也就意味着其成功经验难以广泛复制；最后，虽然日本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非常发达，但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经济停滞问题已历经近 30 多年无法解决，且新世纪以来其政府换届好似走马灯，其民主制度已备受质疑，这使其他国家无法在最紧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方面向日本求取经验。

中国经验的重要价值在于中国可以为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借鉴和帮助。中华文明历经百年动荡，而后重新崛起，这也是亚非拉其他文明梦寐以求的；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连接东亚、中亚、南亚，“一带一路”倡议更是贯通整个亚洲，连通非洲和拉美，其他国家将从中国的发展中直接获益；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顶住了苏联、欧美的霸权，继承了自己文明的优良传统，借鉴了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些正是亚非拉大多数国家希望能够做到的；中国成功实现经济改革与稳步增长，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并拥有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强大政府”<sup>②</sup>，这些经验都是亚非

---

<sup>①</sup> [英]赫伯特·威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876 页。

<sup>②</sup>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拉国家所渴求的。世界文明的进步需要亚非拉各国在文明对话中充分交流“中国经验”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要避免西方势力将这种有益的经验转化为敌视的因素。

### 3. 通过文化交流促进文明对话

对于“文明”与“文化”之间颇具争议的复杂关系，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时间维度上，文化的范围更广，俄国学者凯费利也接受这种观点，他在《文化与文明》一文中论述说，从时间上看，文化的容量比文明要更大一些，它包括蒙昧和野蛮人的文化财富。但他进一步论述道：从空间上看，文明是许多文化的结合<sup>①</sup>。由此可见，文化与文明有极大的重合之处，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两者同时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sup>②</sup>泰勒主要强调文化和文明的精神层面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意涵，之后的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综合了文化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有关人类一般发展和特殊生活方式的意涵，将文化概括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sup>③</sup>，这也意味着，文明的交流是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整体性交流。

正如2018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域交流蓬勃开展”。在生活方式的整体性交流中，文化价值理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层面的交流触及了最深层次的精神交流，涉及了不同民族对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共通性理解。思想与理念总是润物细无声，其交流的效果不如物质层面的交流会立竿见影，但却更加深刻而持久。如何通过文化交流促进文明对话是各国必须重视的问题。各国文化都是在现代文明中谋求发展，各民族都需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谋求文化创新，而文化创新不仅仅是文化价值理念的革新，更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变革，各个文明都需要在变革与进步中形成交流与互信。文化创新在根本上是面向未来、促进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这个方面，各国更容易达成共识，基于此，各国可以展开广泛的文化交流，促进文明对话，以求共同发展。此外，文化交流是一种弱化了“政治性”的交流，不似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交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更容易获得民间和学界的共鸣，因此，文化交流及文化共识在文明对话中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同志曾提出，“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潜移默化，滴水穿石。只要我们加强交流，持

---

[Kindle Edi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11.

① [俄]凯费利：《文化与文明》，黄德兴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8期，第23页。

②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③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6页。

之以恒，偏见和误解就会消于无形”<sup>①</sup>。“一路一带”与“命运共同体”需要在经济共同繁荣、政治互相包容的同时，不断促进文明间和文化间的交流，寻求价值理念的共识。

### 4. 构建网络时代的新型文明对话

网络化是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论述道：“网络社会代表了人类经验的性质变化。”<sup>②</sup>也就是说，网络给人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新兴媒体带来的是一场伟大的“人类交往革命”。当今世界的一切都被这场“人类交往革命”所浸染，文明的对话也不例外。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提出了“互联网思维”的概念<sup>③</sup>，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类的认知和思考，这也就意味着文化的状态和文明的形态也已经随之发生巨大的变革。如何在网络时代构建面向未来的文明形态是文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主题之一。同时，文明对话的形式也应基于网络做出调整和革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民众如何在网上加强联系和互动并规避网络风险、如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打造特色的网络交流平台、如何通过网络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等问题，也是未来亚洲文明对话需要认真对待的。

### 5. 建立文明对话的机制、管道与形式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要推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同时也是要加快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需要我们切实地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推进世界各国间的文明对话，要“先建秩序，再谋发展”“先谈认同，再谈合作”“先谈他利，再谈共赢”，并以此作为运行机制的基本理念。建立文明对话的常态机制，就是实现这一基本理念的重要途径。如何设计好文明对话的机制体系，并使之常态化，是其关键所在。中美对话已经建立了由70多种对话形成的机制体系，但由于缺少足够的文明对话机制，中美间的互信、理解仍是两国之间巨大的障碍。未来的文明对话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作为“元首倡议”“顶层设计”的文明对话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这种对话也带来了政府意志突出、官方色彩浓厚的特点，如何设计出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立体对话管道，是做好“一带一路”视阈下文明对话的重要方面。首先，文明对话要严格区分政治对话、经济对话、军事对话的界限，突出文化、艺术领域的对话；其次，要在官方对话管道畅通的前

---

<sup>①</sup> 《习近平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第01版。

<sup>②</sup>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77页。

<sup>③</sup> 《习近平：强化互联网思维 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新华网，2014年8月19日。

提下，将民间对话管道作为文明对话持续发展并不断产生“润物细无声”影响的基础。既然是文明的对话，就必然要突出文明对话特有的灵活形式，要抛弃我们固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对话的“惯性思维”，用更加适合于文明对话的形式来展开。



## 结 语

习近平同志在 2018 年 8 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sup>①</sup>。“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个绝佳的“中国方案”，它要打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构建的国际大家庭。面对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和各类不同声音，中国方案在具体的实施中一定会对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正能量。

（课题组组长：孟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课题组成员：于蒿昕，胡学峰，黄艳，王瑞娟）

---

<sup>①</sup>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人民日报》，2018 年 8 月 28 日，第 01 版。

## 联系方法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复旦大学智库楼313办公室

电子邮件：brgg@fudan.edu.cn

电话：86-21-65641298

传真：86-21-55670203

网址：<http://brgg.fudan.edu.cn>



责任编辑：陈如江 刘慧芹

终审：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发印时间：2018年10月